

货币联盟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基于奥匈帝国的研究

杜文洁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自 2010 年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扩散纵深发展,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备受争议。货币联盟的政策协调问题也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为了更好地研究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文章以奥匈帝国二元制经济体为例,重点考察奥匈帝国的经济发展,运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奥匈货币联盟区与贸易一体化的关联,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一个一般性的两国货币联盟政策协调理论模型,进行深入讨论,以此对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起到经验借鉴作用。

关键词: 奥匈帝国; 二元制; 货币联盟; 政策协调; 欧元区

中图分类号: F8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098(2013) 06 - 0010 - 07

一、引言

随着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暴露了一些缺陷和不足,许多学者都逐渐认同,货币联盟体内,分治的政府将使得联盟内部的经济政策协调更加困难,因为不同的政府存在不同的偏好及经济目标,这使得多个经济体的政策难以协调一致,影响整体经济发展(Friman, 1993^[1]; Hammond and Prins, 1999^[2]; Iida, 1993^[3]; Milner, 1997^[4]; Milner and Rosendorff, 1997^[5]; Mo, 1995^[6]; O' Halloran, 1994^[7]; 郑联盛, 2010^[8]; 郑慧, 2011^[9])。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反对意见,Robert Pahre(2001) ^[10]认为,如果分治的政府会使得财政货币政策难以协调而影响经济发展,那么依据此观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类似美国这种联邦体制的国家(各州财政政策独立),其经济内部协调将必然比一个拥有统一国会制度的国家更难,而事实是美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首位。

对于货币联盟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在历史上,存在着许多货币联盟(见表 1),比如,奥匈帝国(Austria—Hungary)、瑞典挪威经济联盟(Sweden—Norway)、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BLEU)、东非货币局制度(EACB) 等经济体,都曾迅速发展和崛起,之后大多因政治原因而解体。

表 1 过去及目前存在的货币联盟

货币联盟及成员国	时间	单一货币	单一央行
德意志关税同盟	1837—1871 年	否	否
LMU(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希腊、瑞士)	1865—1927 年	否	否
SMU(丹麦、瑞典、挪威)	1873—1920 年	否	否
奥匈帝国	1878—1922 年	是	是

收稿日期: 2013 - 10 - 08

作者简介: 杜文洁(1988 -),女,江西景德镇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011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学。

货币联盟及成员国	时间	单一货币	单一央行
BLEU(比利时、卢森堡)	1922—1999 年	否	是
EACB(斯威士兰、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	1919—1977 年	是	否
CMA(南非、莱索托、纳米比亚)	1920 年至今	否	否
CFA(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多哥、塞内加尔)	1945 年至今	是	是
CAEMC(中非共和国、喀麦隆、刚果、乍得、加蓬、几内亚)	1945 年至今	是	是
ECCU(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格林纳达、蒙特塞拉特)	1950 年至今	是	是
EMU(欧元区)	1999 年至今	是	是

其中奥匈帝国的二元制经济体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货币联盟,也非常接近现今的欧洲货币联盟(EMU),为了更好地研究货币联盟内政策协调,本文将重点考察和借鉴奥匈帝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奥匈货币联盟区与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关联,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一个一般性的两国货币联盟政策协调理论模型。因此,在文章第二部分对奥匈帝国经济联盟做一个简明的介绍;第三部分通过数据及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数据分析;第四部分构建一个一般性的两国货币联盟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理论模型;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结果,并作出结论。

二、奥匈帝国二元制经济

1866年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大败,这次战败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致命的打击,战败后,为保证王朝的延续和避免帝国的瓦解,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优先解决匈牙利民族问题,通过与匈牙利民族代表戴阿克和安德拉西的谈判,于1867年签订奥匈协议(Ausgleich),以建立二元制度解决匈牙利分立问题。

根据奥匈协议,奥地利帝国改组为由两个国家组成的二元君主国,国家的正式名称是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在二元制下,两个国家共拥一个君主,拥有各自独立的财政当局,共享同一种货币,共同的关税政策及市场,具有统一的央行——奥匈银行,关于君主国财政的承担份额,协议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谈判,1867年奥地利的份额确定为70%,匈牙利为30%。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奥匈帝国的二元君主制经济非常接近现在的欧洲货币联盟(EMU)。

二元制的建立起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现代经济的作用。总体上看,1867年的政治让步,在经济领域内产生了积极效果,推动二元帝国向工业化国家过渡,经济成就亦相当可观。1867—1914年间,奥匈帝国经济虽然曾遭受挫折,但保持着稳步增长。到一战前夕,奥匈帝国是世界上工业大国之一,其工业总产值占欧洲的6%,在欧洲工业国中,奥匈帝国位居第四,排在英、德、法之后。

二元制度下,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建立了关税同盟,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也修建了铁路网,帝国的两部分经济联系密切,互补性比较强,彼此间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奥地利工业品出口到匈牙利,匈牙利农产品主要是谷物、面粉和牲畜出口到奥地利,保护性关税使匈牙利农产品几乎独占奥地利农产品市场。在1901年,奥地利出口的34%输往匈牙利,匈牙利出口的72%输往奥地利。帝国铁路的修建大大促进了国内的商品、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奥地利与匈牙利间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帝国的金融一体化也稳步进行,资本与GDP比例的增长率例也逐渐提高(见表2)。

表2 1870—1910年GDP与资本比例的增长率

	1870—1890 年	1890—1910 年	1870—1910 年
奥地利			
Kausel	1.24	1.38	1.31
Good and Ma	1.1	1.31	1.2

	1870 - 1890 年	1890 - 1910 年	1870 - 1910 年
Schulze	0.7	1.35	1.03
匈牙利			
Kausel	-	-	1.67
Good and Ma	1.49	1.51	1.5
Schulze	1.48	1.26	1.37
奥匈帝国			
Good and Ma	1.2	1.36	1.28
Schulze	0.99	1.32	1.15

资料来源: Schulze(2000)^[11] 基于 Good and Ma(1998)、Katus(1979) 的估算。

在二元帝国的奥地利本部,19 世纪最后 30 年,工业迅速发展,就发展速度而言,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尤为突出。从 19 世纪 80 年代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石煤的开采在捷克大约增长了 3 倍,褐煤的开采和铁的生产增加了 5 倍。据统计,1913 年奥地利的工业生产比 1880 年增长 2.5 倍,每年平均增长 3.9%。1870 年奥地利的煤产量为 730 万吨,1913 年增加到 4390 万吨。同期,生铁从 27.9 万吨增加到 175.8 万吨,钢从 2.2 万吨增加到 261.1 万吨。20 世纪初,大企业已在奥地利到处出现,在 1905 年至 1912 年的时期,大企业的数量增加了 50% 以上。1912 年奥地利有 200 个以上的卡特尔,股份公司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垄断在国家经济上已开始起着决定性作用。^[12]

二元制时期,匈牙利农业发展最为显著。匈牙利农业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大地产的保留,据 1895 年的统计,拥有 1420 英亩以上的大约 4000 户大地主占有全国可耕地的 33%,由于土地、农业技术的改良,谷物轮种制的推行,机械化耕作的推广,特别是播种机、打谷机、铁犁以及化学肥料的应用,匈牙利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使播种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长。在 1873—1913 年间,小麦产量从 130 万吨增加到 410 万吨,增长 3 倍;燕麦产量从 55 万吨增加到 125 万吨;玉米产量从 115 万吨增加到 420 万吨,增长了 4 倍;大麦和黑麦每种收获量几乎增加两倍;马铃薯和甜菜增产最为显著,到大战前夕,马铃薯从 85 万吨增加到 515 万吨,甜菜从 24 万吨增加到 380 万吨。

三、两国的货币联盟政策协调模型

现考虑一个由两国组成的货币联盟,假设是奥地利及匈牙利,货币联盟区域与区域外其他国家的汇率是弹性的,奥地利、匈牙利及货币区外之间存在国际贸易,它们之间的商品是不完全替代的。奥地利商品的供给是由奥地利商品的需求决定,匈牙利的商品供给由匈牙利商品的需求决定。奥地利的货币需求等于奥地利的货币供应,匈牙利的货币需求等于其的货币供应。在奥地利,匈牙利和区域外经济之间存在着资本的完全流动。因此,三者的利率相同。假定名义工资和价格的调整速度缓慢。

$$Y_1 = A_1 + \alpha M + \gamma G_1 - \delta G_2 \quad (1)$$

$$Y_2 = A_2 + \alpha M + \gamma G_2 - \delta G_1 \quad (2)$$

Y_1 表示奥地利的产出, Y_2 表示匈牙利的产出, M 是奥匈帝国货币的供给, A_1 表示其他影响奥地利产出的因素, A_2 表示其他影响匈牙利产出的因素。 G_1 表示奥地利政府的支出, G_2 表示匈牙利政府的支出, α 表示货币乘数。货币政策的内部效应是正数,即 $\alpha \geq 0$ 。 γ 和 δ 代表各自的财政政策乘数且均为正数,外生变量分别是奥地利、匈牙利的产出和货币供应量。

根据(1)式,奥地利的产出由联盟货币供应量、奥地利政府支出和匈牙利政府支出决定,根据(2)式,匈牙利的产出由联盟货币供应量、匈牙利政府支出和奥地利政府支出决定。

联盟货币供应量增加,会提高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产出,奥地利政府支出增加,会提高奥地利的产出,降低

匈牙利的产出。同理,匈牙利政府支出增加,会提高匈牙利的产出,降低奥地利的产出。增加1单位的货币供应量,奥地利的产出会增加 α ,匈牙利的产出也增加 α 。奥地利政府支出增加1单位,其产出也会相应增加 γ ,匈牙利产出减少 δ 。匈牙利政府支出增加1单位,其产出也相应增加增加 γ ,奥地利产出则减少 δ 。

对(1)、(2)式求导,即稳态也可以由初始的产出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量来表示。基于(1)、(2)式,稳定状态下的模型,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Delta Y_1 = \alpha \Delta M + \gamma \Delta G_1 - \delta \Delta G_2 \quad (3)$$

$$\Delta Y_2 = \alpha \Delta M + \gamma \Delta G_2 - \delta \Delta G_1 \quad (4)$$

ΔY_1 是奥地利初始的产出缺口, ΔY_2 是匈牙利的初始产出缺口, ΔM 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值, ΔG_1 是奥地利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量, ΔG_2 是匈牙利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量,外生变量仍然是 ΔM 、 ΔG_1 、 ΔG_2 。

初始阶段,假设奥地利和匈牙利均存在未充分就业,且匈牙利的失业率高于奥地利,央行的目标是保证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首先,为了保证奥地利的就业率和产出,奥地利先增加政府支出,货币供应量应增加量应等于奥地利产出缺口,即:

$$\alpha \Delta M = \Delta Y_1 \quad (5)$$

同时,匈牙利政府为保证就业率和产出,也增加财政支出,解出(3)、(4)、(5)式,可得:

$$\Delta G_1 = \frac{\gamma \Delta Y_1 - \gamma \Delta Y_2}{\gamma^2 - \delta^2} \quad (6)$$

$$\Delta G_2 = \frac{\delta \Delta Y_1 - \delta \Delta Y_2}{\gamma^2 - \delta^2} \quad (7)$$

这即是初始阶段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各自增加的支出额。第二阶段,奥地利政府和匈牙利政府政策合作,要在联盟内实现充分就业,即:

$$2\alpha \Delta M = \Delta Y_1 + \Delta Y_2 \quad (8)$$

此处 $\Delta Y_1 + \Delta Y_2$ 表示联盟内初始的产出缺口, ΔM 表示所需的货币供应增加量,在第二阶段,考虑到产出的滞后性,由于在初始阶段,奥地利政府支出增加,会减少匈牙利的产出,同时,匈牙利政府支出增加,会减少奥地利的产出,抵补作用下两国仍存在产出缺口,因而继续增加货币供应量,解出(3)、(4)、(8)式,可得:

$$\Delta G_1 = \frac{\Delta Y_1 - \Delta Y_2}{2(\gamma + \delta)} \quad (9)$$

$$\Delta G_2 = \frac{\Delta Y_2 - \Delta Y_1}{2(\gamma + \delta)} \quad (10)$$

结果即是第二阶段两国政府支出的增加量。两国的产出缺口会逐渐减小,循环几轮阶段,直至达到充分就业。理论上,说明两国政府的货币财政政策合作能有较好的协调并能达到充分就业。

为了检验此模型的有效性,代入数值,假设 $\alpha = 1.5$, $\gamma = 1$, $\delta = 0.5$,于是(1)、(2)式可以写成:

$$Y_1 = A_1 + 1.5M + G_1 - 0.5G_2 \quad (11)$$

$$Y_2 = A_2 + 1.5M + G_2 - 0.5G_1 \quad (12)$$

假设充分就业时产出为1000,初始奥地利的产出是970,产出缺口为30,匈牙利产出是940,缺口为60。首先,由于货币乘数为1.5,联盟内的货币供应增加量为20, $\Delta M = 20$,于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产出均增加30,此时匈牙利的产出缺口为30,由于产出的滞后,第二阶段,匈牙利政府支出增加40,奥地利政府支出增加20,匈牙利政府支出增加,导致其产出增加40,奥地利产出减少20,相应的,奥地利政府支出增加,导致其产出增加20,匈牙利产出减少10,此时匈牙利的产出净增加为30,这样,奥地利匈牙利均可达到充分就业。

四、实证分析:货币联盟与贸易一体化

研究奥匈二元制经济体的文献并不多,Dornbusch(1992)^[13],Garber和Spencer(1994)^[14],Cheikbossian

(1995)^[15]对奥匈帝国的经济进行借鉴,从中得出经验教训,进而对苏维埃经济联盟货币改革提出意见。Cohen(1993)^[16]基于经济、组织和政治因素对包括奥匈等历史上6个货币联盟经济体进行研究,认为最有助于为货币合作提供可持续性的是拥有统一主权的政府。Jarko Fidrmuc(1995)^[17]研究了帝国内部,由于区域移民产生的语言及文化障碍,一定程度上影响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为了综合分析奥匈帝国货币联盟与周边经济贸易的发展,本文采用引力模型,用以研究帝国时期的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已经广泛运用于国际贸易的研究。Tinbergen(1962)和Poyhotnen(1963)最早分别独立提出了贸易引力模型,基本含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引力模型能方便的识别制度变量的作用,如国家间的货币制度安排等。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将19世纪的奥匈帝国经济作为一个真实的货币联盟样本,考虑到汇率的波动性、交通运输成本及贸易保护,首先分析模型的三组解释变量。第一组解释变量,是用以反映进出口规模的结构变量,第二组是由交易成本组成的解释变量,第三组是货币制度变量。模型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text{Trade}(ij, t) = a_1 * \text{gdp}(i, t) + a_2 * \text{gdp}(j, t) + a_3 * \text{dist}(ij) + a_4 * \text{protimp}(t) + a_5 * \text{protexp}(t) + a_5 * \text{Vol}(ij, t) + a_6 * \text{GS}(ij, t) + a_7 * \text{AH}(ij) + a_9 * \text{LU}(ij) + a_{10} * \text{SU}(ij) + a_{11} * \text{PAR}(ijt) + a_6 * \text{cons} + u(ij, t)$$

贸易潜力 Trade 由进出口量的对数测量,所有变量都采用对数形式,交通运输成本由距离(dist)的对数表示,汇率的波动 Vol 可以由两种方法计算得出,第一种方法的 Vol,即双边的汇率波动,是汇率变量的相关系数,第二种方法,是计算汇率的改变,即 $\log(e(t)/e(t-1))$,当汇率稳定于平价时,第一种方法计算得出的 Vol 值比较小,当汇率围绕趋势稳定时,第二种方法计算得出的 Vol 值比较小,但总体结果是两者基本相等。贸易保护变量由关税/贸易总量计算得出, AH、LU、SU 分别表示奥匈帝国、拉丁货币区制度及斯堪迪维亚货币制度下的进出口总额代表拉丁货币制度下的进出口总额。

(二) 数据及其来源

选择16个国家从1880年至19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这16个国家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丹麦、瑞典、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士、英国和俄罗斯。数据来源于各个国家的财政部官方网站、OECD、ECB、中经网及经济统计年鉴。

(三) 实证结果

运用大量的面板数据,采用 OLS 和 2SLS 法,得出的实证结果见表3。

表3 实证结果

Equation	OLS		2SLS	
	1	2	1	2
GDPimp	0.57 (4.80)	0.57 (45.71)	0.55 (40.92)	0.53 (37.1)
GDPexp	0.76 (56.35)	0.74 (54.48)	0.78 (49.3)	0.76 (44.8)
Dist	-0.79 (-25.64)	-0.99 (-35.35)	-0.79 (-25.4)	-0.99 (-35.4)
Prot_imp	-3.07 (-13.25)		-3.13 (-13.5)	
Prot_exp	-1.01 (-3.64)		-0.95 (-3.6)	
Bilateral vol. vol1	-1.4 (-0.71)	-5.44 (-4.7)	-1.3 (-0.67)	-5.6 (-2.74)

		OLS		2SLS	
Gold	Stand-	0.31	0.41	0.31	0.41
ard:	GS	(6.21)	(8.22)	(6.23)	(8.24)
Austrio—Hun-		1.16	1.29	1.16	1.28
gary:	AH	(16.69)	(18.40)	(16.71)	(18.22)
LatinUnion:	LU	-0.11	-0.11	-0.013	-0.11
		(-0.33)	(-2.7)	(-0.33)	(-2.7)
Scand. Union:		0.65	0.52	0.67	0.48
SU		(8.45)	(6.85)	(8.25)	(5.8)
PAR		-0.04	0.007	-0.04	0.009
		(-0.45)	(0.087)	(-0.47)	(0.108)
Intercept		-2.28	-1.18	-2.4	-0.98
		(-7.55)	(-3.9)	(-7.2)	(-2.77)
N		3558	3558	3558	3558
R squared		0.66	0.64	0.67	0.64

从结果可以看到,产出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随着国家的规模越大,双边贸易也增大,但这种增加不成比例),同时距离具有负效应,即距离越远,双边贸易越小。汇率的波动具有促进作用,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贸易保护对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点并不奇怪,但是在一般的研究中,对交通运输成本与汇率的波动性进行回归分析时,很容易忽略贸易保护这个变量,当加入这个变量时,就会影响到其他2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当去除贸易保护这个变量时,汇率的波动及距离的效应非常显著。

通过实证,比较AH、LU及SU三个货币制度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货币联盟对奥匈帝国的贸易额具有很大的影响,与此相反,LU的系数却比较小,说明奥匈帝国的货币联盟对其经济贸易具有推动作用。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奥匈帝国的二元制度对其国内、国际经济贸易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简单的二元货币联盟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这对于欧盟货币经济体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何保持欧元区整体宏观经济运行,平衡各个国家间的经济目标,合理的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充分发挥综合调控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是欧元区目前面临并急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Friman H. Richard. Side - Payments versus Security Cards: Domestic Bargaining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gotiation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3(47) : 387 - 410.
- [2]Hammond and Prins. The Impact of Domestic Institutions o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 Taxonomy of Results from a Complete Information Spatial Model [J]. pape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1999(9) : 2 - 5.
- [3]Iida. When and How Do Domestic Constraints Matter? Two - Level Games with Uncertainty [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3(34) : 403 - 426.
- [4]Milner ,Helen V.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26 - 354.
- [5]Milner and Rosendorf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 Elections and Divided Government as Constraints on Trade Liberalization [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7(41) : 117 - 146.
- [6]Mo.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The Role of Agent Veto in Two - Level Games [J]. A-

- merican Political and Science Review ,1995(89) :914 – 24.
- [7] OHalloran Sharyn ,Political ,Proces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225 – 236.
- [8] 郑 慧. 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及启示 [J]. 中国金融 2011(17) : 25 – 27.
- [9] 郑联盛. 欧洲债务问题: 演进、影响、原因与启示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3) : 35 – 38.
- [10] Robert Pahre. Divided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ustria – Hungary ,Sweden – Norwa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J]. European Politics Volume 2001(2) : 131 – 162.
- [11] Schulze. New Estimates of Income Level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870 – 1910 [J]. In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 2000(3) : 35 – 127.
- [12]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1) : 215 – 226.
- [13] Dornbusch ,Rudiger. Monetary Policy of Post – Communism: Lessons from the End of the Austro – Hungarian Empire [J]. Weltwirsch. Arch ,1992(3) : 391 – 424.
- [14] Garber ,Peter M. ,and Spencer ,Michael 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ustro – Hungarian Empire: Lessons for Currency Reform [J].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191) : 156 – 178.
- [15] Cheikbossian ,Guillaume. Seigniorage ,Delegation and Common Currenc [J]. DELTA Document ,1995: 95 – 134.
- [16] John ,Benjamin. Beyond EMU: The Problem of Sustainability [J]. Econ. Politics ,1993: 187 – 203.
- [17] Jarko Fidrmuc. Economic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ustria – Hungary ,1867 – 1913 [J].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edited by Peter Mathias and Sidney Pollard ,1995(1) : 814 – 886.

The Coord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Monetary Un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Austro – Hungarian Empire

DU Wenjie

(School of Finance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Since 2010 ,along with the depth deterioration of European debt crisis ,the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in Euro zone has been disputed gradually. The policy coordination in currency alliance also becomes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research on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ustro – Hungary Empire binary system economy as an example ,focus on research in Austro – Hungary Empire's economical development ,examines the link between Austro – Hungary currency alliance and the trade integration by introduction gravity model ,then based on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 ,constructs a general currency alliance policy coordinated theoretical model ,provides the experience to the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in Euro zone by the above discussion.

Key words: Austro – Hungary Empire; binary system economy; currency alliance; policy coordination; Euro zone

(责任编辑: 张秋虹)